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 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 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李石秦译 郑之驥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arl Kautsky
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avid
Shub and Joseph Shaplen*
The Rand School Press, N. Y., 1946
根据纽约兰德学校出版部一九四六年版译出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李石泰译 郑之骥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3年4月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96 定价(七) 0.45元

印数 2,001—3,000

出版者說明

叛徒考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写过一系列反苏反共的著作，如：《无产階級专政》、《民主与专政》、《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无产階級革命及其綱領》、《处于絕境的布尔什維主义》、《国际与苏俄》等。本书是在他死后由大卫·舒勃和約瑟夫·舍普倫从他在一九三二到三七年間所写的著作中选編并譯成英文的，一九四六年在紐約由美国空軍研究机构兰德学校出版。

美国实用主义的重要人物悉德尼·胡克(叛徒、托派分子和极端反共分子)在为本书写的緒言中說：“本书选輯的文章，在某一意义上，可以看作考茨基的政治遺言……它們是从他一生智慧蒸餾出来的东西”。所謂“蒸餾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坚决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无产階級专政的道路，而坚持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的道路。这是全书的主綫。

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从认定所謂“社会主义是从人类的本能‘自由、平等、博爱’中产生”这一論据出发的，因而认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应当“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而进行斗争”，从而主張社会主义者，不論什么派別，都应该在这个原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考茨基躲在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来曲解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他含沙射影地攻击布尔什維克是宗派主义者，說：“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釋都受到政府的监督，……这样一种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

来实行統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傳，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一种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东方迷信的地位。”

考茨基以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一論点为借口，来为和平过渡論寻找根据。他誣蔑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以前还“沒有完全摆脱雅可宾—布朗基主义的老傳統”，但是以后也贊成某些国家如英国、美国、荷兰有和平过渡的可能。考茨基說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欧洲大陆的一些軍事官僚国家已經发展了民主，因此再讲暴力革命是不合时宜了。

考茨基埋怨人們对无产階級专政一詞的含义認識不清。据他說，“这个名詞絕无廢棄民主而轉到絕對权力的含义”，他引經据典地来证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无产階級专政就是指民主議会的共和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摧毁集中的国家机构最重要的目标，唯一的的就是建立民主”。

考茨基一再強調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才是先进的，而用暴力夺取政权，“它的根源是由于工人階級的落后和沒有办法，并不是由于无产階級的知識、精神力量和独立性达到了高級阶段”。认为只有运用自由、平等的普选权去夺取政权才是上策。

如果說考茨基在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方式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概念的理解上的爭論还讲点“論据”（虽然是强詞夺理的和片面曲解的），那末，在談到布尔什維主义，談到列宁和十月革命，談到苏維埃的无产階級专政等等問題时就只是破口大罵，完全是一派无賴的口吻。

考茨基誣蔑布尔什維主义就是把布朗基主义或巴枯宁主义的色彩的各种观点注入馬克思主义的产物，声称列宁是这一派中間的突出人物。

考茨基攻击列宁破坏党的民主，实行独裁，他說：“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符合于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民主組織。但是列宁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錯誤。他开始为党中央机关要求愈来愈大的权

力，同时不断地限制党员的权力。”他誣蔑列宁“像个一神教的上帝”，“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上帝。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别的上帝存在”。

他把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說成是列宁搞独裁的結果。由于列宁反对和孟什维克統一，其后果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說“在俄国革命中，列宁的目的不仅要破坏一切自治机关，而且除开他自己的党以外，他要破坏一切其他的党派和社会組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擇手段，“采用了谎言、誹謗和殘忍的暴力来对付一切敌对者”。

考茨基还說，本来俄国的革命“不要专政，不要恐怖，只要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就可能实现”，“可是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們由于无厌地貪求权力，終于使这个統一战綫不可能組成”。“列宁曾为了民主一直进行着斗争，現在他却在民主的廢墟上树立了他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軍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构，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如果列宁沒有解散立宪會議，俄国也就会免去內战及其一切的恐怖、殘杀和破坏。”

考茨基对战时共产主义、新經濟政策、五年計劃大肆謾罵，攻击它們都是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他对苏联的建設成就也无法否认，可是他却以奴役来解釋。他說外国旅行家們站在新建的巨大企业之前惊羨不已，然而“他們很少想起，什么样的奴役与人类自尊的降低和这些巨大企业的建設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根本否定“集体农庄”，說这是强迫农民的农奴劳动，不能提高生产，只能制造饥饉。国家对人民許諾的“未来幸福”是海市蜃楼，根本不会实现。

考茨基的結論是，“我們的职责不仅在廢除資本主义的秩序，而且在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来代替它。但我們必須反对那些力量，他們的目的是在破坏資本主义之后，仅仅建立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因而“我們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是它的反面”，“不是計劃”，而是“秩序、反秩序、无秩序，或者是調整、

再調整、亂調整”。

最后他大肆攻击苏联的国家制度，說“布尔什維克政府所結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階級統治。布尔什維克誠然打破了旧的階級，但在他們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階級，新的貴族分子”。在这个政权之下，“多数的老布尔什維克已經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經从革命者的水平，墮落到諂媚的廷臣的地位了。那些昔日的宣揚过平等学說的共产党員們現在变成了逐級上升的党阶制度的暴发戶，成为布尔什維克教会的教皇以下的大主教和紅衣主教。而新的一代的共产党員們，絕大部分是无良心的野心家”。“不是消灭一切階級，而是以新階級代替旧階級，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維克革命的結果，正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結果一样”。

这个中譯本是完全根据英譯本轉譯的。书中引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中的文字，我們加注了中文本的出处。但这里所引的文字往往与經典著作原文有出入，为了存真，仍按本书英譯本的引文翻譯。还有，原书中的 dictatorship 一詞，在譯文中为了行文方便，有时譯为“专政”，有时譯为“独裁”，其意义并无区别。

目 录

悉德尼·胡克：緒言.....	1
一 社会主义的起源.....	13
二 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16
三 布尔什維主义的起源.....	30
四 列宁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35
五 共产国际.....	42
六 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么？.....	47
七 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德国納粹主义的兴起.....	64
八 社会主义与民主.....	75
九 取得政权之路.....	81
十 “統一战綫”.....	88

緒 言

继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沒有人能比考茨基有更大的知識上的权威来論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代人中間，他形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他是那些教育广大男女工人群众懂得自己的社会作用的老师的老师。他的著作差不多具有百科全书的范围，其中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立場，对人类的文化与历史作了独创的和灵活的闡釋。

本书选輯的文章，在某一意义上，可以看作考茨基的政治遺言。这些文章是在他去世前不久流亡在外的时候，以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不磨灭的信念而写成的。它們是从他一生智慧蒸馏出来的东西，討論的是对我们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題目——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間的差別。所謂社会主义，我們的意思是指关于民主計劃社会的社会哲学以及真誠地信奉这种哲学的政治团体的活动，这种哲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經充分地、但还没有最后地得到形成。所謂共产主义，我們的意思是指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論与实践以及它的附屬物，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对于这两种哲学的差別的极度无知，是今天政治討論中的丑事之一。不仅在通俗著作中，在专栏作家和广播評論員政治上沒有識見的急就章中，并且还在著名政治人物的声明中，都表現了这种极度的无知。丘吉尔譴責英国工党企图建立一个无形的独裁政府，也許是暴露了他的敌恨，而不是缺乏知識。但是，像亨利·华萊士(Henry Wallace)这个好心好意的人，慨叹美国的政治民主过分了，告訴我們說，苏联正享有“經濟民主”，并且还进一步提出他

要保留“自由企业”的保证，我們对于他又有什么好說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許多人心目中造成混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这两个名詞就时常相互替用；但也时常代表不同的事物。匆忙地閱讀标籤可以使粗心的人把醋当作酒喝。共产党人的习惯，在政治上方便的时候，就把自己說成是社会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其目的是在于助长这种混乱。但是，主要原因要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去找，即布尔什維主义的創始者們原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历史事实，掩盖了后来历史的发展，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对于了解布尔什維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性质，却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一个社会运动正像一个人一样，不能只根据它的根源，而要根据它成长后所結的果实来加以判断。弑亲不但是一个个人行为，也是一个社会現象。馬克思和斯大林的理論与实践之間的差別，正像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和佛朗哥(Franco)的理論与实践之間的差別一样大。

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社会的經濟組織的一种学說。它的孕育的根源来自人的和历史的哲学。經濟組織被认为是使人类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支配下、以及从别人不正当的权力下解放出来的工具，以便每一个人在和别人建立积极的相互关系中，能够有发展个人人格的机会。它的理想不仅是政治的民主，而且是生活的民主，它的方法是坚持运用最高的智慧，以求发现有效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理想。要是手段与理想不能协调一致，这些手段便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个理想——在理想所能够实现的限度以内。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彻头彻尾——在实际上和在名义上——都是民主的原故。这就是为什么衡量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所采用的计划的尺度，就是社会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的民主的质量和程度，而不是倒轉过来。将社会主义和一个计划的社会等同起来，而不問这个社会是怎样计划的和为了什么而计划的，就像是將医师的职务——他首先关切的是病人的健康——和集中营虐待狂的看守人的职务——他使用了医师的知識来折磨人类——等同起来一样。

不可否认，苏联有一个计划经济。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民主的任何迹象，苏联代表着一种“工业奴隶制”，正如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所确切地描写的那样。^①俄国在反击希特勒的自卫中所表现的军事上的英勇，并不能否定这种工业奴隶制的存在，正像俄国在反击拿破崙的自卫中所表现的军事上的英勇，不能否定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之下的农奴制的存在一样。主张说俄国有权不受外来的妨碍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回事。但是赞成或为俄国专制的政治实践作辩护，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因为这些实践在别的国家内，即使其表现的形式不是如此可恶，还是要受到极端严重的谴责的。已故总统罗斯福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在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评论，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你们和全世界所知道的苏联，是一种绝对的独裁，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绝对的独裁是一样的。”

一方面对苏维埃的独裁给予最令人作呕的称赞；一方面对俄国以外的共产党的主义和活动又给予有礼貌的轻蔑；这就成了“总体自由主义者”（“totalitarian liberals”）越来越时髦的行径。英国的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美国的勒纳（Max Lerner）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们思想方法的简单公式是，俄国的政策和实践从历史上和道德上来看，差不多总是正确的；而他们自己国内的共产党的路线差不多总是错误的。他们承认，这条路线是在莫斯科制订的，而同时又嘲笑它的愚蠢和缺乏责任感。这样，他们就暴露出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混乱。因为，他们所承认的东西显然就是指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个两面政策。如果僕人的行动仅仅是忠实执行主人的命令，那末主人的责任就不能置之不问。拉斯基和勒纳承认，在全世界任何一国的共产党的曲折的进程中，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都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而采取的。假如共产党人因其愚蠢罪行或因其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任何一项道德理想而

① 《召唤》（《The Call》），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三日。

应受譴責，那末，根据什么邏輯，那些組織他們犯罪的人能够脫卸責任呢？

順便應該提到的是，考茨基断然反对拉斯基的新发现，即所謂俄国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恐怖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这意思是說，沒有另外的途徑可循。事实上，共产党人在每次决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紧要关头，另外的途徑显然是有的：从一九一八年他們用刺刀挑掉了民主选举出来的立宪會議起（这个議會他們也曾主張召集，为的是希望他們会占得一个多数），到一九三九年斯大林一納粹条約，使希特勒沒有第二条战綫的威胁，并給他扭开了綠灯，使他毫无阻碍地去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止，都是如此。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拉斯基对它們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都提出过譴責。假如立宪會議沒有解散，俄国的发展和欧洲的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考茨基作了相当合理的詳細的討論。如果有人认为历史上不存在重大事件的另外的途徑，而完全依据了历史事实来作他的道德的判断，那末，他不仅必須相信，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得相信，誰胜利了，誰就是对的。

那些对政治隔漠的人——本书主要就是写給他們看的——也許会惊疑，各国共产党（不管它們伪装成什么样的名字）是否真正在本质上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許多证据的綫索确定地表明，共产党根本的忠誠对象，不是一套价值或原則，而是由俄国統治者所决定的俄国的具体利益。共产党的口号、綱領活动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轉变，有着百分之百的相互关系，其間只是允許有一段傳達命令的时间距离罢了。外国的控制甚至伸展到各国共产党的組織机构和領導机构。在任何一个具体問題上，每当俄国决定了采取某种行动路綫的时候，人們总是能够成功地預言，共产党将会說些什么，做些什么。在政治上和在科学上一样，成功的預言就是理解的正确檢驗。

美国共产党屈服順从的記錄是这样的明显，已經无需任何詳細的說明。在一九三五年第三国际的第七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以前，

它曾經公开宣布它的反民主的性质。威廉·福斯特，它的現在的領袖，写道：“在专政之下，一切資產階級政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社会党——都要取消，只有共产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党单独活动。”（《到蘇維埃美国之路》[«Towards Soviet America»]，275 頁，紐約，一九三二）。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它又宣布了自己对民主的信仰，以配合共产国际总書記季米特洛夫所提出的“特洛伊木馬”的战略。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約和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之后，罗斯福帮助了英国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就被斥为“战争贩子”。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希特勒侵入俄国的时候，共产党就要求立即对德国作战，于是又变成了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德国战败以后，它又逐步回到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所站的立場上来了。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都表明是从同一个模型鑄出来的。各次轉变的指令都包含在公开的文件里，不論哪个探究者都很容易得到。甚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是由克里姆林指定的。党的會議仅仅是通过形式的动議加以批准而已。根据西欧蘇維埃軍事情報局前任局长克历菲斯基(W. G. Krivitsky)將軍所說，每一个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都有一个委員是屬於俄国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以前是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国外支部的。

但是，有人也許会問，共产党总是热烈地赶赴各項有价值的事業，从支援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以至嬰孩牛奶免費供应等等，这不是真的么？的确，社会上哪里有不平的事，共产党就会奔向那里。但它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对任何有价值的事业有什么忠心，而是为了要在那些已經建立起来的組織內夺取战略的权力地位，并給予抗議运动以一个政治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决定于外国即俄国的利益。許多好心的、但政治上却很天真的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却落到这个策略的圈套中去了。他們对社会党人的不肯和共产党人合作感到迷惑。他們宣称，只要共产党人带头从事有价值的活动，他們看来就沒有任何必要和共产党人决裂。他們坚持，他們是为了善良的目的在利用共产党人，不管共产党人的隱藏的动机如何。

正是因为这种悲剧性的眼光短浅，站在美国共产党的陣綫上的社团才发展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数目；一大批自由的組織也才被共产党人夺去了領導的位置，因而被弄得支离破碎了。这种短浅的眼光忽視了一个事实：只要俄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共产党接到了新的指示，共产党人就会利用他們的战略位置，来改变所在組織的目的，把这个組織从原来所致力的一项有价值的事业，轉向往往和原来的目的背道而馳的一些新的目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們就破坏这个組織。不論什么情况，他們总是能够損害这个有价值的事业，使他們的那些厚道的自由主义同盟者只能发出一些无力的憤怒。

因此，一个和平組織，由于共产党员願意比其他人員更辛勤地工作，允許了他們担任領導职务，但总有一天会发现，共产党员們接到了俄国放棄和平路綫的命令以后，就会設法改变这个組織的目的，或者就破坏了它。共产党员領導的工会，将会发现他們的領導是热心的、积极的，但是工会的本身利益却总是会从屬於政治路綫。这就是說，應該鼓励平行的工会还是单一的工会；應該作出不罢工的保证还是取消罢工的保证——这些問題首先是取决于政治立場，而不是取决于工会的立場。政治立場总是只有一个，即这对于俄国的国家利益将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一个专为筹集款項給貧民窟区域的嬰孩免費供应牛奶的組織，是由共产党员領導的。这不是最合法的么？但是这个組織的成員将会发现，在某个会上，出席的人并不太多，竟会作出決議譴責中国政府或倫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者譴責英国对希腊的政策。这些并不是空想出来的例子。作为一个实例，我們还可以举出有些社团的經驗，这些社团是几年前組織起来抵制德国貨的。共产党员們宣称他們对这项有价值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弄到了控制这些組織的重要位置。會員們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共产党抵制德国的路綫在一个晚上改变了，共产党領導把这个組織扼杀了。

但是，即使那些共产党都是俄国伸到外国的手臂，正如共产党

員們所宣稱的，俄國豈非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和自由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工人國家”嗎？最後分析起來，俄國的性質是具有決定性的。人們既然相信它是進步的、愛好和平的，鼓舞它的那種信仰將來可以拯救文明（拉斯基）；並且相信，它是新的民主的一個萌芽的形態，那末，他們就不能自相矛盾地在另一方面又攻擊那些至死都為這個國家服務的共產黨。但是清醒的事實是，俄國在受著一個單一的少數人的政黨的統治，這個黨又受著它的書記處無情的控制。那里絕對沒有反對者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罷工要受到死刑的處分。工人的生活條件比在沙皇時代還要壞。^①關於它的勞動法，坎特伯雷的副主教以及其他的辯護者們保持了聰明的緘默。它的勞動法強制工人依附於他們的工作，遲到或曠工被處以很重的罰金或監禁處分，受處罰的工人的家屬則被逐出他們的居住區域。^②革命初期所取得的文化上最重要的利益現在都已經取消了。這個國家整個的知識和學術生活，都周期地受到國家政治保安部所支持的共產黨教條的威脅。這個所謂工人階級的祖國實際上是一個可怕的官僚警察國家，工人們在這裡享受到的經濟保障和政治自由，遠不及在任何一个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的多。它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民主主義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無論他們自己知道或不知道，共產黨的黨員、同情者和同路人的根本的忠誠對象，就是這個警察國家。

政治上歷來有一條原則：任何一个國家的國內外政策，在根本上是不能分開的。然而，同一個社會和政治制度，也可以和外交政策的多種多樣的變化相適應。在多種多樣的變化中，究應如何選

① 關於這點，有極多的證據，參閱曼尼亞·戈登(Manya Gordon)的《列寧時代前后的工人》(《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紐約，一九四一年版。

② 要找官方文件主要章節的引文和摘要，參閱弗羅林斯基(M. T. Florinsky)的《斯大林對勞動者的新政》(《Stalin's New Deal for Labor》)，載《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卷四十五，第一期，一九四一年三月，第38—50頁。

擇，固然要取決於本國的內政制度，同樣也取決於別國的外交政策。這對於沙俄和對於蘇俄都是同樣的。在一九一四年，沒有人推論說：因為俄國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個同盟國，所以它是一個較高一級的民主國家，或者必須宣布延期批判它的比較溫和的國內專制——所謂比較溫和，是指它比之於近代德國和俄國的獨裁所表現出來可能達到的程度而言。但是自從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迫使斯大林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同盟者以後——在這以前，斯大林一直譴責它們應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一種光榮歸於俄國國內專制的狂潮就開始了，與此並行的，就是貶低西方政治民主，認為西方政治民主在歷史上不及俄國獨裁的計劃經濟進步。人們違反了邏輯和道德的每一項健全的原則，竟稱這種經濟是“經濟民主”。事態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當那些奮鬥終生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批評了一下在神聖的俄羅斯祖國的名義下所犯的反民主的罪行時，他們就被勒納之流指控要發動反蘇戰爭，而勒納之流卻對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曾經提出過更嚴厲的譴責。橫蠻無理和有計劃的混淆是非結合在一起，實在令人駭然。在某些反動的實業界中間，也仿效了這種作法，這就表明了，當有利可圖的市場在向他們招手的時候（如德、意、日的情况），資產階級對他們所宣布的對於民主的忠誠是如何的靠不住；同時也表明了，民主社會主義者所面臨的教育問題又是如何的巨大。

儘管社會和政治制度不同，美國和俄國是能夠和平共處的。最後分析起來，俄國的制度是俄國內部問題。但責任就在於俄國要保持它是內部問題。我們畢竟沒有組織一個“杰弗遜主義國際”^①，充當民主的第五縱隊，企圖去顛覆俄國的制度。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美國軍隊有限的干涉，正如李維諾夫（Litvinoff）在一九三三年所承認的，是由於嚴格的軍事考慮的動機而採取的。當時在阿爾漢格爾的軍事物資有落入德國人手中的危險，日本人也有

① 杰弗遜（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系美國第三屆總統。——譯者注

深入西伯利亞的危險，但即使如此，這次干涉還是不應該的。不過這個愚蠢的大錯，決不能和共產國際二十五年以上的積極干涉美國事務相比。歐爾·白勞德(Earl Browder)的被免除美國共產黨領導職務，是由法國共產黨的領袖杜克洛的一個暗示決定的，從這個遠距離控制的事實看來，共產國際雖然在形式上是取消了，實際上還是非常活躍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員出現在俄國的衛星國家中擔任政府要職，也進一步証實了這點。每一次對俄國作出的片面的讓步，就等於給俄國的進一步侵入打開了大門。

俄國的統治者是嚴格的現實主義者，而天真的美國外交家却以為，極權主義者實在不過是變相的“俱樂部”政治家，竟把許許多多利益自動地讓給他們，那麼他們當然要充分加以利用，這是怪不得他們的。

美國和俄國之間的和平最好的保證，就是堅持一個嚴格的互惠的原則。假如都有和平的意願，那末，堅持這個原則就是鞏固國與國之間和平關係的唯一的辦法。假如沒有和平的意願，那末，不論作出多少的片面讓步，也絕對不可能保持和平的。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把這點顯得水晶似的透明了。有些人主張，德國型的和俄國型的極權主義，彼此之間的差別比兩者的類似點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他們認為，兩者最突出的差別，就是俄國是願意和平的。很好，我們就相信他們的話吧。俄國在芬蘭、波蘭、東歐和亞洲的行動的記錄，我們就給它打個折扣吧。所謂俄國孤立在各個民主國家之間、永遠不能安全的這個官方說法，我們就把它忘掉吧。讓我們假設俄國像我們一樣，也是有和平意願的；然後根據了這個假設的意願辦事。結果怎麼樣呢？自然，還是要互惠的原則。假如我們邀請俄國的記者前來自由地旅行，並且報導美國的現實情況，那末，讓我們要求俄國也把同樣的權利給予美國的記者。假如我們邀請俄國調查團前來視察我們的製造工業，查看國際條約是否付諸執行，那末，就讓我們要求，俄國也允許給它的工業作同樣的視察。假如我們裁軍，讓我們要求俄國也作同樣的裁軍。還